

“后GDP时代”，干部考核什么？

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化要求。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中国将以什么具体指标考核官员政绩？近期，各地正通过实践探索，不搞GDP竞赛、将GDP从考核的硬指标中拿出，以新的内容来考核和评价政绩。

政绩考核告别“GDP唯一”

“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
无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还是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化要求。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将以什么具体指标考核官员政绩？公报提出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其标准又是什么？对于习惯了GDP思维的各级官员来说，如无GDP量性要求，在新的时期，其工作重心将置于何处？另一方面，要改变中国贫富、区域、城乡差距，必须依靠发展，如何科学处理这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探究，官员政绩与“人民满意”挂钩，其深层含义在于，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必须进入深水期。否则，唯GDP“马首是瞻”，或许仍将时隐时现。

幸福和GDP增长不同步

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均对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十五”计划提出，要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十一五”规划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总量跃居为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解决了温饱之后，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却产生了。

“GDP呈两位数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前教育李兴山认为，人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是民生问题之中很要害的环节。

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接近2/3；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为57.5%，下降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

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稳定，需要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但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发现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阶层和特殊的利益集团手里。”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向记者指出。

彭真怀认为，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他发现，一些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比如，企业家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以及不断滋生的腐败问题。“人民幸福感的减少，看似是一个现象，其实说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彭真怀认为，此种检验，首先其冲的就是“不能仅仅看GDP数据的增长”，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马首是瞻。“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43.6%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居无定所；占中国70%人口的农民，其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出现的GDP增长，能



打破唯“GDP”的怪圈

否经得起这些群体的检验？”彭真怀质疑。

而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对此，彭真怀称之为“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这不能怪地方干部，主要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李兴山向记者分析说，当前，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义”，是导致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太重视环境保护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政绩观，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彭真怀认为，很多年来，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数据说话，有时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数字增长，也被

当作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据。

各地出台新举措考核干部

浙江干部考核不再搞GDP竞赛，卸掉不合理的“政绩枷锁”。现在，浙江新的干部综合考核办法不再搞单纯的GDP竞赛，讲究“由里往外美”，把过去捆在身上的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绩枷锁”卸掉了。用当地干部的话说，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同样也是政绩。

同时，浙江省还导入综合素质评价，从制度设计上促进德才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能够胜出。譬如，合理设定综合素质评价指标；突出岗位要求，按照“学过、干过、管过”等资格条件设计标准，让这些综合素质高、实绩突出但不擅长考试的干部也有机会进入选拔范围。尤其突出官德考核；加强对社交圈、生活圈、生活圈，实行考察预告进社区、对任现职未满3年的实行延伸考察。

四川不再下达GDP增长率指标，更侧重优化经济转变方式。日前，四川省政府重新修订的对市州目标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今后，省政府在年初不再向市州政府具体下达GDP增长率指标，通过对12项发展指标的考核，确定各市(州)年度工作的目标。

成都市目标管理督查办公室主任孙波说，以前，由于GDP是考核的硬指标，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得不采取造假、虚增、空报等手段，玩“数字游戏”，以致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等不良现象。此次修订大幅减少考核指标，将GDP从考核的硬指标中拿出，引导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更加侧重经济转变方式方面的优化，更加注重强调民生，关注百姓的生活质量，可以使地方官员将心思用在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上。

广东开启教育问责先河。《广东省2007、2008年度地级以上市党政领导干部基础教育工作考核办法》日前公布。据了解，此次基础教育工作考核，由广东省委组织部和省教育厅牵头，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具体实施。这

也是广东省首次对全省21个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履行基础教育工作职责进行考核，开启了中国教育问责的先河。

在考核结果中，不仅高度肯定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重视发展教育取得的成绩，针对我省部分地市级未能完成考核“作业”，报告也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基础教育工作考核考核办法〉的通知》及其实施细则，考核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与领导干部的提拔、调整任用、奖励和责任追究相挂钩。

网友声音：为干部考核“轻GDP重民生”新导向叫好

长期以来，GDP一直是干部考核评价的“第一指标”和“主要指标”，大多数干部的升迁被绑在僵硬的GDP数据上，不少党员干部被GDP牵着鼻子走，身上背着沉重的“政绩枷锁”，以致有些领导干部为追求片面的GDP和政绩，做出不少急功近利的“傻事”，出现了“带血的GDP”，有的地方虽然财政收入增加了，却因征地引发激烈冲突，导致维稳成本激增，这样得来的财政收入既充满百姓的辛酸，又潜存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四川和浙江两省敢于打破陈规，直接拿GDP考核“开刀”，“祭旗”，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十分令人佩服和称道。

卸掉“GDP政绩枷锁”方能科学发展

以GDP的数字形成干部的“政绩枷锁”，是不可取的，这会让干部的工作走向偏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已经提出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新执政理念，同时也提出了让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因此，要树立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同样是政绩的观点。只有破除单纯的GDP政绩观，才能让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新闻时评

“国富”与“民富”如何协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同步增长”的提法，表明“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从以往注重“国富”转向更加注重追求“民富”。笔者认为，“国富”、“民富”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体国民能否从中普遍受益、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不断增进幸福感。当前，我们应关注国富、民富各种情形下的民众公平受益的可能性，以及“十二五”时期应改进的相应问题。

“国富”的一种形式是高税收，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国家收入比例较高。这种情形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是不是用于民众普遍受益的方面。目前的问题是，国家财政，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行政费用支出等方面，一些设施的建设，只是少数人受益或富裕群体受益较多。而用于民众普遍受益的财政支出比例偏低。这样一来，“国富”反而可能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十二五”时期，在通过“两个同步增长”适当降低国家收入比例的同时，更应着重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使之向民众公平受益的方向倾斜。

“国富”的另一种形式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大量占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这种情形好不好，也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国企对全民福祉的改进是否起到了必要的作用。目前的问题是，国企高速发展只是带来了资产规模的不断增长，并没有带来全体民众收益或受益的增长，国企利润上缴国家很少，更别说分配给普通民众。国企获得一定的垄断权利，就应承担起其必要的社会责任，促进全国民众福祉的普遍提高，而随意收费、涨价、索取国家补贴、员工高福利等行为，不仅未能让民众普遍受益，反而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十二五”时期，一方面要逐步减少国企占用社会资源和占用社会财富的比重(要与其对全社会和全体民众的贡献成比例)，另一方面，应强化国企的利润上缴，使全国民众普遍受益，如直接用于全国居民社会保障账户的充实。

“民富”的一种形式是人均收入水平以较快速度增长。这种情形是否就一定有利于人民福利普遍增进？也未必。要看是普遍增长，还是高收入者群体、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情形下的增长。以平均数而论的“民富”并不可取，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未必能够得到同步增长。因此，“十二五”时期，要想公平地实现“两个同步增长”，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快于平均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前提，否则必然导致平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同时而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的结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最为根本的，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来保障普通民众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

“民富”的另一种形式是民众收入水平的普遍增长，但却承受着高房价、高物价、高通货膨胀率，同时承受着较大的生活压力而幸福降低。这种形式的“民富”是“十二五”时期最应预先防范的，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覆盖绝大多数的民众、覆盖民众最担心的方面，是其根本。“民富”还有一种形式是：民众收入水平普遍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整个社会都处于“投机囤利”的氛围之中，各种各样的投机炒作(股票、期货、房地产、理财产品等)。最终，普通民众的财富都被各种“投资活动”吸走。这样的“民富”，更不是普通民众能够普遍受益的。因此，“十二五”时期，不应把推广“理财活动”作为增加民众收入水平的手段，而应通过适当的制度以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主要是储蓄)能够保值增值。

总之，“国富”与“民富”，两者并非是对立的，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如何将两者协调起来，各自在增进人民福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使广大民众能够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使全社会收入差距合理缩小。钟茂初

示众惩戒公民不是法治社会所为

日前有媒体报道，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两位农民因进京上访被县政府开大会“示众”。只是受到警告和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在县政府广场被警察押着胳膊，众目睽睽之下无地自容，乃至有了“成了个罪犯”的感觉。

无独有偶。11月2日，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拘留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这17名村民被民警反剪双手站在主席台下，身穿橙色或绿色马甲，胸前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涉嫌的罪名或违法行为和各人名。此举随即遭到广泛质疑。对此，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宣传部发布的“情况通报”称：“在非正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社会效果明显，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

示众，目的在于“杀鸡儆猴”，在于告诫公民服从。也正是这种在某些人看来屡试不爽的做法，公然践踏公民个体的人格尊严。估计上述“辟谣”声明的起草者自己也不会相信，示众是为了所谓的执法公开。真正的执法公开是将执法

决策程序与执行程序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而不是让公众产生恐惧感。哪怕是经由法院判决有罪的公民，也没有被剥夺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何况只是轻微的行政处罚。其实完全不必避讳，示众以及对公民的行政处罚本身，都是当地政府炫耀自身权力的手段，是对公民损害所谓地方形象的公然报复。

以示众作为仪式来达到羞辱公民的目的，凸显着一种逼仄的气氛：一方面是早被明言禁止的权力恶行，却有不少地方政府阳奉阴违；另一方面是在权力的蛮横运作过程中得不到尊重的公民。原本应该实现基本制衡的司法与行政，在这样的场合却往往达成共谋，作为共同体直面公民的无助，任凭权利受损而毫无愧色。这种傲慢与无知令人愤怒，民众对权力的认知也在这样的拉锯中一点一点消解，一次次重演。

究竟有多少手段被用来对付上访者，仅最近的新闻热点便可以归纳出“黑监

狱”、非法关押、拘留、劳教甚至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等多种。而这些屡试不爽的手段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甚至被写入地方法规，原因在于这种对公民权利的赤裸侵犯，是以“集体决定”的名义进行的，而且很少有官员真正为此付出代价。公民上访，地方政府当然面临压力，但这种压力的化解从根本上取决于访民问题的解决。有论者直言“把数目惊人的截访费用，哪怕是拿出一部分，就能解决掉访民的问题”。这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不愿(或者还不习惯)认错政府的政府。殊不知，政府最大的面子，就应该来自于对一个又一个公民个体尊严的制度化尊重。

再堂皇的权利宣示，在毫无悔意的权力暴虐面前都是浮云。抛弃广场式的运动司法，对“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惩罚”具备制度性的厌恶，本身就是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现代法治应该有起码的文明约束，这种惩罚的“盛会”应该彻底退场。公民的人格尊严，本就不是由谁赐予，更没有什么力量有权剥夺。南文

灰色技能盛行 反映了怎样的世态人心

为了在白纸黑字的应聘条件之外更优秀，近年来，一些求职者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灰色技能，也就是学习喝酒、打牌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0.7%的人认为在职场竞争中具备“灰色技能”很重要，其中20.0%的人表示“非常重要”。受访者中，64.6%的人表示自己具备灰色技能。《中国青年报》11月9日)

喝酒比工作重要，关系比能力重要，拥有业务能力未必吃得开，但掌握灰色技能就会在职场上畅通无阻。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不过，这跟“女秘书都被老板潜规则”一样，都是伪命题，世俗的偏见。“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女秘书”，也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灰色垄断了市场——事实上，所谓“灰色技能万能论”是站不住脚的，最起码也得需要能力作为支撑。老板可能喜欢会喝酒会来事的人，但老板一定不会喜欢干不了工作的人，因为他要白白支出一份工资。

这么多的人认可灰色技能，说明“灰色技能万能论”已成了一种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潜规则，这种潜意识就构成了大众“偏见”——灰色技能就等同于“被老板潜规则的女秘书”。只是被潜规则的女秘书终究是少数，灰色技能或许侥幸于一时却无法成功一世，除了少数人的丑态产生的辐射效应之外，群体意识形态和话语的盲目跟风，也无形中放大了潜规则，从而导致舆情以偏概全。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潜规则的风行，产生了令人尴尬的负面循环。仔细梳理起来，很多盛行的潜规则大抵都是如此——譬如给医生送红包，当初主动索要红包的医生是个别，但当“送红包”的潜规则被放大之后，不该收的也开始收，不想送也开始送了。到了后来，患者不送红包便心生不安，不被潜规则的女秘书便感觉无法升职，不掌握灰色技能就不能进职场。

现实的语境下，我们一边唾弃着厌恶着想象中的、被潜规则的女秘书和娇滴滴的女秘书，一边却又默默遵照某些潜规则行事——这种吊诡的事儿和心态足以说明，被潜规则的其实不是灰色技能和女秘书，而是世态人心。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潜规则也不是一天流行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这终究也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和奉行导致的结果，称之为“多数人的暴政”也不为过。事到如今，与其争论灰色技能是不是真的有效或者女秘书是不是都被潜规则了，还真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各类潜规则征服。 陈一舟



手机“僵尸病毒”横行，有没有人在查？

一种新型手机病毒近日出现，短短一周内全国就有将近100万部手机感染。这种病毒通过短信等渠道，悄悄地把你和你亲友的手机一个个都变成“僵尸”，一旦手机感染，它就会被人操纵花你的钱去帮别人发短信。这种病毒不但很难被用户和运营商发觉，变种后甚至能灭掉杀毒软件。100万部手机每天耗话费200万元。(11月8日《北京晨报》)

短短一周内全国有百万手机感染“僵尸病毒”，而9月发生的事情到11月才被央视曝光，这期间相关部门更是缄口不言。的确，从经济利益上来看，运营商并不是“受害者”，反而和始作俑者一样，是“受益者”，只不过始作俑者受益

是信息传播，而运营商获益的则是“财源滚滚”。在这样一种“双赢”局面上，难怪运营商继续“装聋作哑”，而说是，监管部门为何也不见动静，再次让媒体曝光走到了前面呢？背后真相有待挖掘。

现在的问题是，一是监管部门没有任何表态，这“僵尸病毒”到底有多大的危害，还没有权威的论证，媒体曝光的危害只能当参考，不能当依据。二是运营商两个多月了也没说一句话，赚了多少钱公众也不知情，这是不是太没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了？三是始作俑者到底有没有被追究，有没有人在查？现在的情无息声是不是为了不打草惊蛇，那如今的进程如何了？

如此治病

因会导致所有细菌都产生耐药性，10月底，含有NDM-1基因的泛耐药菌在我国一现身，就即刻引起了卫生部门的重点关注，这意味着，我国“超级细菌”的家族又有了新成员。“耐药菌在我国的发展势不可挡，如果用药习惯不改变的话，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陷入无药可医的困局。”对于目前临床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现状，有关专家表示担忧。记者经过调查发现，患者盲目依赖抗生素、药品购销市场的巨大漏洞、医院的利益驱动及相关监管措施的乏力，是导致耐药菌加剧的“四宗罪”。 焦海洋/图

这三个问题，是当前最亟待得到答复的无疑是经济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旦手机中“僵尸病毒”了，那么中毒者是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可能他什么也没干，但白白地扣钱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名消费者，我们的权益应该得到最大的保障，而作为运营商，应时刻保持我们系统的安全，这是二者建立契约关系必须履行的职责与义务。因而，用户手机中“僵尸病毒”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运营商来买单，因为他们们的系统存在漏洞，才让人有了可乘之机，而消费者显然是无辜的受害者。期待监管者尽早介入，督促运营商给受害的消费者一个说法。 龙敬飞